

她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美得端正，显而易见，读书时是校花，去工作了是厂花，属于那种有共识的美。有人说她脸型生得好，双颊从眼角处渐渐往内收拢，线条优美流畅一气呵成，直至下巴放缓速度，完成一个圆润精致的交汇。有人说她鼻子美，挺秀而没有凌厉逼人的气势。有人欣赏她的眼睛，温柔里带着笑意。而我最喜欢的是她的两道眉毛，长而略疏，浅浅横于额上，不论喜怒都是含蓄的，说不尽的柔情。

美人的美不止于五官，还在于姿态。她是七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女儿，从小习惯了娇宠也听惯了夸赞，因此始终带着一份不争不抢的淡然从容。另一点更可贵的是她对于这份美的珍视和矜持，任有多少爱慕者追求，却一辈子只跟一个人好过，让她想的人想了一辈子，念她的人念了一辈子，天长日久，没有上演俗烂的生活剧，却成全几段佳话。

我记得以前最爱看她梳头，站在镜子前，一头烫得微卷的发丝流云一样地散开，接着一只手灵巧地拈起一缕翻卷上去，另一只手从台子上拿一根夹子，迅速送到嘴边轻轻咬一下开合处，然后在脑后把发丝固定住。只要几分钟的功夫，一头长发就被高高盘起，白皙的脖子露了出来。我每次仰着头虔诚地看着，百看也不厌，直到她梳完头一转身，裙摆扬起。

因为她的这份美，使我童年的回忆和旧照片里但凡有她出现的地方都笼罩上一圈特有的诗意的光晕，它也是我对于美好的最初的启蒙。当我还不具备鉴赏能力的时候只觉得跟她在一起的世界比跟别人在一起的更美好。在路上遇到

流年剪影



美人

摇摆鲸

的熟人总愿意跟她多说一会儿话，聊菜筐里的茄子，聊物价，聊共同的朋友，随便什么都行，他们也会对我表现出额外的热情和善意，虽然我能感觉到这些关心大多并非真心，但还是会因为受到了关注而兴奋不已。我从大人特别是男人们眼里的光芒看见她的与众不同。

相反跟着我爸爸出去一切就平淡得多，没有人送我橘子和糖果，路过食品店没有免费的蛋筒壳吃，碰到熟人会相互点点头，但他绝没有使对方停下脚步或从自行车上下来的魔力。

一天我刚从外面回家，见爸爸和她吵了架，

她正伏在小桌上低声哭泣，几根柔软的发丝黏在她湿漉的眼角。我站在渐渐暗下来的院落看着这幅景象和她微微抖动的肩膀，心里像是突然飞进了一只小蛾子，上下扑打。我被一股奇怪的力量牵引着，走过去坐到她的身边，摆出和她一样的姿势也认真地哭起来。我哭得专注而执着，哭得伤心欲绝，已经不记得后来是怎样被劝住的。几天后她对着镜子梳头，突然从镜子里看着我问，那天下你为什么哭呢？我嗯咽的说不出来。她试着猜测，你是怕我和你爸爸分开吗？我点点头，其实心里想说的是我想和你一样美。她以为

一个人对于昨天和久前的记忆，有时是倒过来的，往往离得越久远的事情越是清晰，最初的生活影像透亮无比，而昨天做过了什么事，见过了什么人，说过什么话，想起来却模糊不清，欲说还休。这有点像斯皮尔伯格的镜头，景深有时处理得让你能看见一朵花、一把雨伞的骨条，看清一个中年人立体的面孔和眼眶。新读到老杜的书《昆仑风雨》，从老杜文字中的景深，我也看见了这种久远的清晰和画面的颗粒。

我说的老杜就是“老公安”杜斌国，一个看起来有些孔武却偏偏写起文章来的作家。

一个人，单独把一段过往的生涯记录下来，说明这段生涯对他来说是敏感的。杜斌国把这本书的小标题定为公安散文，用个人纪录片的方式推出他已经发黄的公安生活，这种珍贵的回忆，是杜斌国的财富。公安人员，现在大家都不习惯这样叫了，叫警察。在上世纪后半叶的大段时间里，公安两字如雷贯耳，村里或街道里突然来一两个公安，那是会让大家心里踏实或让空气凝重一阵子的。如今，这样的情景淡多了，城市乡镇的路面上，天天见公安，公安在群众中频繁出没，他们身上原有的那点神秘感渐渐稀释了，大家也多改口叫他们警察，而不是公安。这种转变，相信杜斌国是感触最深的。多年以后，他书中强调公安两个字，而不是警察，这样的心绪，是一种低回的怀念，也是一种脆弱的眷恋，溢出了杜斌国对这段生涯的别样情结。

公安散文，我是第一次接触。题材化的写作，是古今文人的大风风景，因为熟悉和深入，能化生活为文字，能娓娓道来，能发出幽情，能减少复制别人的感觉，可感度高，只要取舍好，细节流动起来，文字不艰涩，这类文章总是受读者喜爱的。杜斌国在倒流的时光河道上，把自己的公安往事拉伸开来，前后端详一番后，选择认为可以重现的那些人和那些事，进行一种有意无意状的叙述，转折过渡，清白煮文，字句干净节制，有一种老酒的醇厚，说事情又不拖沓，而且是写旧事不酸腐，写得意思不炫耀，加上是个人的独特经历，有些情节一波三折，读起来能让人轻易进入到他所建构的文本世界里。

杜斌国放置在书首的那篇《兰都从警记》，是他徜徉回过去时光第一道大门，他款款开启，晃动的镜头移向最初的青葱岁月和粗粝记忆，时间定格在一九六九年。一个年轻人，脚穿大头靴，头戴长绒皮帽，坐在大卡车上驶向昆仑山某一片山脚下，一脸那个时代的神情。至今快五十年了，杜斌国对从警之初的点点滴滴和人生体验，在本文中的叙述几乎达到了纪录片脚本的细腻，这又回到了景深的技术上了，只不过杜斌国推出来的是文字的景深。隔了那么久的旧事，杜斌国写得依然历历如昨，无疑这段最初的经历成了杜斌国最顽固的记忆，一丝一缕的琐碎事都很细小，但也很锐利，直插入他的情感之根，直到今天他依然能听到自己走路、说话、与同事喝酒甚至狂风吹过树梢的响动，以及血液流动和壮志撞击胸腔发出的窸窣窣窣的声音。

《老枪，伯宁朗》，是杜斌国从警的另一种情感。他说，不带枪的警察，就是不长犄角的山羊。这句话散发出了杜斌国初踏上公安工作岗位、梦里也走马挎枪的生涯热度，稀释了艰苦环境中的孤独和无力感。这篇文章里，枪成了他某种表达的道具，通过一支枪，他找到了职业的角色感，流露出对革命工作深沉的致敬。在领枪的时候，他与枪库老股长的情趣对话，十分有味道，没有太多的渲染，直接说枪的事情，最后一句“可惜，伯宁朗带了八年，只试过一枪”，让读者油然生出一种空落。我想，杜斌国对这支枪的怀念，这句话就足够了，文字的张力，有时就是如此不堪赘语。

其他的文章不多，但在本书中却一样自成一段杜斌国的人生，或可完整叙事，或可感叹一番，或是一壶浊酒，或是一袋清寂的案卷。我手边闲读，读出一个老公安在岁月中的逝水留痕，读出一个憨厚男人的当年青春，读出当下海量虚伪文字外的真挚、自然和干爽，像听到一声昆仑山下传来的缥缈驼铃。

名家翰墨

火车

孙文波

我第一次坐火车大概是三岁左右，那已属于记不得的事。有记忆的坐火车经历是开始于六岁，父亲把我从陕西接回成都。只有一个印象：兴奋。而真正记忆开始深刻的是我十二岁时因为与母亲吵架，她拿带长木把的扫帚打我，我反抗时失手打肿她眼窝，在她说等我父亲从下放劳动的工地回来告我状后，第二天，我在她上班后撬开她放钱的写字桌抽屉，拿了几十元钱跑到火车站买了票，坐火车回到了陕西爷爷奶奶身边。我的举动把母亲搞得很狠狈，一个月后在爷爷奶奶护送我回到成都时，还一个劲地对爷爷奶奶说：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干，真得没想到……这次经历搞得我心里很得意。也把坐火车看作很美好的事情。

但坐火车哪里是什么美好的事情？1966年，父亲带我和妹妹回陕西，在从陕西回成都的火车上，我第一次发现坐火车其实是非常恼火的经历。那一次，因为我们是中途上车，根本找不到座位，整个旅途我们都是挤在厕所里的，先是在厕所里站着，后来干脆爬到厕所顶篷上的格层里，一天半时间都无法活动，到成都人已经变形。

但这只是坐火车很难受的第一次经历，以后越来越多。而到了下乡到农村，几年时间里，每一次往返成都与下乡地都可以说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为什么？一是因为作为知青没有钱，坐火车基本上是逃票，东躲西藏像小偷；二是快车根本上不去，只能坐慢车，而慢车上人特别多，每次都像死鱼一样与人挤在一起。我的一位同学曾形容我们坐火车的情况，说这种火车哪里是运人，完全就是运猪。他的说法虽然夸张，但也不失形象。其实，这并不算什么，当兵到部队的那一次，我坐的是闷罐火车，所谓闷罐火车就是货车。几天时间，我和其他人挤在通风窗户很小，没有厕所的车厢里，那情景与西方电影中的镜头一模一样。

通过计算，我发现我坐的火车计有：运煤车、运木材车，那是知青时爬车回成都；老式硬木客车，不舒服得像坐刑具；闷罐车，不止当兵那一次；其他还有晚点火车，玻璃坏了风忽忽向身上灌的火车，当然，也坐过软卧车，但仅仅两次。

也许，我把坐火车描述的太惨。不过我的确太少感受坐火车是享受，哪怕时至今日也是如此。2000年初，在从成都到北京的火车上，虽然已比过去进了一大步，我坐的是卧铺，但却在爬到上铺睡觉时摔下把锁骨摔断了。这件事发生后，我一度发誓再也不坐火车。

不过这怎么可能办到？我听到身边发这种誓言的人不止十个了。每年春节期间，坐火车已经成为不少中国人的梦魇。那种在火车上挤几十个小时无法动的故事，从南到北，总是像风吹入人的耳朵。而我的确做过这样的梦，在梦中一列蛇形的火车上，我被挤得缩到椅子下面动弹不得，尿了一裤裆，在我的旁边是五官都挤没有了的人，脸色惨白的纸。我当即惊醒，一夜再没有睡着，躺在床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做这样的梦？

煮海琢琅

老公安的那些事

王卓森